

王茂福 著

汉魏六朝名赋诗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722王·4
茂福著

汉魏六朝名赋诗译

陝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六朝名赋诗译/王茂福编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ISBN 7—224—02662—X

I . 汉... II . 王... III . ①赋—作品集—中国—汉代—译文②赋—作品集—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译文
IV . I 2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8092 号

汉魏六朝名赋诗译(修订本)

王茂福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8 插页 244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4—02662—X/1·656

定价:25.00 元



《长门赋》



《归田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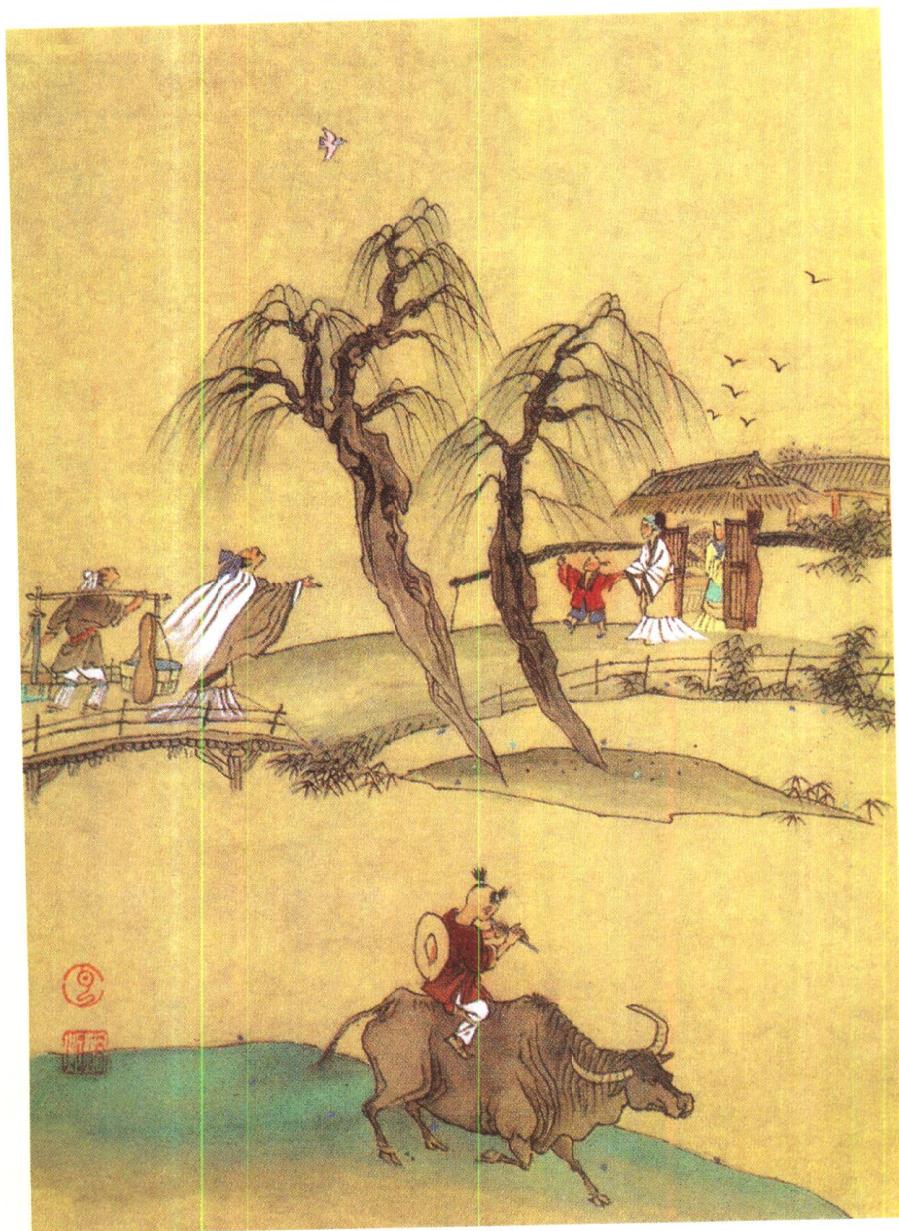
《舞 赋》



《述行赋》



《洛神赋》



《归去来兮辞》



《别 赋》

序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探讨赋这一文体的发展,主要着眼于它与社会经济政治的联系,指出赋的繁荣产生于西汉前期经济高度发展和政治渐趋统一的社会环境中,因而形成了那种铺张扬厉的体制和以歌颂赞美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而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夺政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性,横征暴敛,民生凋敝,战乱频仍。正是因为这一社会环境的转变,不仅使西汉时期文学家在创作中所体现的奋发蹈厉的精神逐渐消失,而且社会现实也已经是无“功”可歌,无“德”可颂了。于是赋的创作由长篇巨制的形式变为短篇,由描写宫殿游猎以供帝王贵族玩赏的作品变为表现个人胸怀情趣的作品。而这一转变的标志是张衡创作的《归田赋》。这一论述本身并无不妥之处,但却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抒写个人胸怀情趣的赋是东汉中叶以后才出现的。这并不符合赋这一文体发展的实际。要纠正这一印象,还需要用文体自身的发展来加以说明。

赋作为一种文体,孕育产生于先秦战国时代的楚国,而全盛于汉代。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摛

文，体物写志也。”又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刘勰的话是论证赋这一文体的特征和渊源的，它说明赋的创作一开始就受到《楚辞》的极大影响，并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即有的赋偏重于描摹客观事物，有的赋偏重于抒写主观感受。尽管这两类赋都着重于文辞的铺排和渲染，但在形体上，前者多采用客主答问的方式来结构篇章，荀子的《赋篇》和宋玉的《风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奠定了这类赋的基本模式。后者更多的是直接用《楚辞》直抒胸臆的形式来发泄内心的愤懑，宋玉的《九辩》，虽然在辞赋的区分上，属于楚辞体，但它较浓的个人色彩，“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基调，为汉魏以来的所谓“骚体赋”所袭用，形成了后代抒情赋的常见的格局（关于辞与赋的区分，可参见我发表于1984年第12期《文史知识》上的《辞与赋》一文）。

汉代的赋正是沿着荀（子）、宋（玉）赋作所开创的这两个方向发展前进的。但由于时代环境的不断变化，在两汉四百年间，它们并非齐头并进。大体说来，汉初文人承《楚辞》创作的余绪，他们所写作的大都是抒发自己情怀的骚体赋。自武帝往后，由于帝王贵族的喜爱和提倡，“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时时间作”（班固《两都赋序》），使专门描写京都、宫殿、苑囿、田猎的所谓汉大赋得以迅速发展，至汉成帝时，竟积至一千余篇，这个数目是惊人的。这些赋是“进御”的，是送给皇帝观赏的，当是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两都赋序》）为内容的赞颂描写性的作品。其中也有一些是短小的篇章，但它们也是采用汉大赋的写法，对具体的事物的声音、容貌、性质、作用进行描叙，同属于“辩丽可喜”、“虞说（娱乐）耳目”（《汉书·

王褒传》)的作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在汉大赋盛行的同时,抒写个人情志的赋也在发展。司马相如是汉赋成熟的代表作家,他既写有《子虚上林赋》这样汉大赋的典范作品,也写有像《哀秦二世赋》、《长门赋》等风格各异的抒情作品,表明了作者并非完全是一个以谄媚人主为能事的无行文人,他也有自己的内心苦闷和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武帝时公卿大臣所献的赋大都亡佚,而从现存的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作品来看,赋在作家手中,不仅是歌功颂德、献媚邀宠的手段,也是发散自己内心块垒的利器。西汉后期以至整个东汉,虽然铺张扬厉的大赋创作仍是文坛的主流,是文学家们表现自己才华的主要方式,但抒发个人情怀的赋也是绵延不绝的,扬雄、班固、张衡等大家,除了写有著名的游猎、京都大赋外,也都各有抒情名赋传世,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总之,赋作为一种文体,就其总体而言,它是一种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文学形式,但并不是单一的。汉代文学发展的实际表明,汉代赋作的大部分作品,以韵散间出的文词对客观事物作描叙,而以虚拟人物间的对话作为文章的框架,是一种散文的表现方式。汉代赋作的抒情作品则不同,它们不仅在体制上承袭了《楚辞》的形式,而且继承发展了屈、宋的创作精神,突出的是抒发作者本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展现的是作者的内心世界,作者的思想、品格、气质、情感,它的表现方式与诗歌是完全一致的。扬雄曾有“诗人之赋”、“辞人之赋”的划分(见《法言·吾子》),我们也可以仿效他的作法,把汉代的赋分成“散文的赋”、“诗歌的赋”两类。这两类赋在汉代不同时期的发展是不均衡的,这固然有社会环境变化影响的因素。

素,但也有作者的主观原因。由于这两类赋的体制、功能有差异,这可以使作者在不同场合、不同心态下,分别运用这两种不同体制的赋来写作,以达到不同的目的,因而这两种赋在不同时期又是同时存在的,并各自沿着自己不同的方向发展着,并不是此伏彼起、相互转化的,那种抒情赋在东汉中叶才出现的印象是不确实的。

当然,赋作为一个整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同其他文体一样,它自身的体制、风格也是在不断地变化。明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把先秦至两汉的赋称为古赋,三国、两晋及六朝的赋称为俳赋,唐代则变为律赋,宋代则变为文赋,就是着眼于文体自身的演变,及各个不同时期赋的特点而论定的。文体的演变,如上所述,它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阐发的这一观点,一直是我们考察文学演变的重要依据。但文体的变化还有着文学内部的原因,特别是各种文学体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有着明显的作用。东汉末年出现了文人五言诗,而随后不久,文坛上竟形成了“五言腾踊”(《文心雕龙·明诗》)的诗歌创作高潮。以诗歌的抒情手法来写赋,这是东汉后期抒情赋数量逐渐增多而给人以面目一新印象的重要原因。建安时代的七子、三曹,是诗歌创作的主将,也是写赋的能手,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都可以称为“诗歌的赋”之佳作。魏晋以后,文人为文多自觉追求对偶;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又根据汉语的四声和双声叠韵的特点,来研究诗句中的声、韵、调的配合,诗歌在古诗之外,又产生了近体;而骈文的勃兴,几乎占有了一切文字领域,成为

这一时期文坛的主要潮流；赋的写作也由此受到浸染，有别于古赋的俳赋（又称骈赋）体制得以确立。因此，我认为就文体演变来说，可以套用哲学上的说法，赋在两汉 400 年间的变化，是一种量变的过程，而经过魏晋至齐梁时代，它才最终地完成了质的飞跃。同是抒情赋，我们绝不会把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恨赋》同汉代的抒情赋混同起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王茂福同志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校友。他在北大期间，听过我讲的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课，又由于我那时担任中文系的行政工作，他是班级干部，接触较多，对于他的为人、学业都有很好的印象。1982 年毕业时，系内曾有把他留校任教的拟议，但终因他有妻小在宁夏而未能实现，我为之惋叹良久。正因为这样，去年 3 月，我从日本讲学回来，他陆续把这部书已完成的书稿寄来，要我替他写一篇序文，我是不能推辞的。茂福这部书所选入的作品，确是汉魏六朝赋的精品名篇，但限于篇幅，大都为诗歌色彩较浓的短篇，而对于这一时期，尤其是汉代那些体制宏大、文辞铺张的描叙性的著名赋作都没有选入。为此，我写了如上的看法，希望有助于读者对这一时期赋的发展有全面的了解，也希望借此来说明茂福这部书的选文特色，它是从一个角度集中而鲜明地展示赋这一文体的特殊风采，会使读者对它独有的艺术魅力有较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茂福这部书的另一特色是用诗歌形式来翻译赋，这是这部书最见功力之处，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茂福的译文的确是诗，是一首首通畅流利的诗。更能可贵的是，他的译文尽力做到大体整齐，骈句、骈赋则多用对仗句式，以体现原文的句式特点；在选词用字上，也力求体现赋

体文学典雅、华丽的风格。从书稿中那多次反复修改润色的痕迹上，我仿佛看到了茂福深夜独坐，苦思冥想，推敲再三的神情。茂福把他这部书题作《汉魏六朝名赋诗译》，“诗译”一词也许有些生硬，但我以为它可以体现这部书的特点，也反映了茂福的追求。相信这部书会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喜爱，并由此使他们增强对赋这一古老文体的阅读兴趣和对它的思想艺术的理解。

费振刚

1991年元月28日于北京

大学畅春园

目 录

序	费振刚(1)
前言	(1)
吊屈原赋	贾 谊(33)
长门赋	司马相如(40)
洞箫赋	王 襄(51)
酒箴	扬 雄(68)
舞赋并序	傅 粟(72)
归田赋	张 衡(91)
述行赋并序	蔡 鬯(97)
刺世疾邪赋	赵 壴(114)
鹦鹉赋	祢 衡(122)
登楼赋	王 翠(132)
洛神赋并序	曹 植(139)
思旧赋并序	向 秀(155)
鵩鵼赋并序	张 华(160)